



春城的约定,世界的期待

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于务实而有力的行动

COP15 综合报道

◆本报记者张倩

滇池荡漾,丹桂飘香。10月的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像一只绚丽的孔雀,盛情开屏,拥抱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代表。

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高级别会议通过《昆明宣言》,提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决心;生态文明论坛发布“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倡议,呼吁各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5天时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为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凝聚了广泛共识,奠定了坚实基础。

兼具雄心与务实目标的大会

一锤定音。10月13日下午15时33分,《昆明宣言》正式通过。主会场锤子落下后的一个小时内,场内掌声雷动,久久不能平息。会后,馆内座席旁、场外中央广场,热烈的讨论声此起彼伏。

这份体现中国智慧、凝聚各方意愿的文本,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各方一致认为,《昆明宣言》为制定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注入更强劲动力,为各国在过去履约中存在的问题开出“一剂良药”。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看来,《昆明宣言》充分展示了各缔约方已准备好进一步提高雄心和壮志。斯洛文尼亚环境与空间规划部发言人斯帕哈利奇表示:“《昆明宣言》对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将产生积极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当被纳入各国政府的政策中,

相关措施须在地方、国家及全球多个层面得到加强。”

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不仅是简单的期许,更在于务实而有力的行动。15亿元人民币,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此外,他还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支持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的“30×30”目标,承诺在撒哈拉区域实施“绿色长城”计划,承诺以180亿欧元落实。承诺法国将30%的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用于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希望其他国家和多边发展银行能同法国采取共同行动。

COP15大会取得的丰硕成果,标志着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正式进入“中国时刻”,其引领和示范效应获得多国称赞。

卢森堡驻华大使俞博生表示:“中国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是一个非常必要且非常重要的举措,东道国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生态文明实践为全球提供经验借鉴

COP15期间召开了一场特别的平行论坛——生态文明论坛,引起各方关注。这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首次将“生态文明”作为大会主题,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鲜明的世界意义。

论坛上,与会代表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转化探索等7个主题,进行深入、广泛的交流。

“万物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从天人合一之道法自然的传统理念,到如今

影响世界的生态文明理念,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过程中,一直为国际社会贡献着中国智慧和方案,并得到了各界的认可和赞许。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布鲁诺·奥伯勒表示:“生态文明理念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关于建立一个重视和保护自然的公正世界的愿景是高度契合的。我对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实施生态文明理念表示赞赏,并期待在这方面深化合作。”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成效斐然。完善政策法规、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国家公园体系、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参与度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下降势头得到基本控制,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

从一则则消息里,世界看见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正在发生的可喜变化: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种群逐步恢复,东北虎、雪豹、藏羚羊、亚洲象、朱鹮等物种数量明显增加;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从“濒危”降为“易危”等级;前段时间,中国云南——COP15的举办地,一个大象家族的浪漫旅行圈粉无数。

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动承担着与国情和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持续为全球环境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新的动力。

面对挑战,还需多方更大努力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数据显示,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目前现存的810万物种中,超过100万物种处于灭绝边缘。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港湾。总理马拉佩在领导人峰会上表

示:“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碳排放的净化者。但同时,我们正面临着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包括我们的森林范围和形势正在前所未有地退化。”

正如马拉佩所言,当前,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很突出。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表示,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共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保护生物多样性,才能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实现我们所期待的可持续发展。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上,无论经济实力、地理位置,所有国家都应承担责任,参与其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本次大会再一次证明,保护自然仅靠某一国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一个事关所有国家甚至事关全人类的事业。”

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现状,“多边合作”成为各国领导人在发言中的高频词汇。

“合作应建立在公认的科学数据以及明确全面的法律框架之上,并尊重各国对其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所拥有的主权。此外,还应该考虑到各国优先的发展方向以及各国国情,同时也要照顾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需要。”普京表示。

此外,资金缺口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挑战之一。尽管中国主动提出以资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举措值得点赞,但当前全球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仍缺少6300亿至8900亿美元。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表示,期待这一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来源可以撬动更多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与支持。

4个月前,一群可爱的亚洲象北上,完美地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6个月后,昆明还将迎来各缔约方的谈判代表,我们期待各方齐聚春城,共绘下一个十年的美好蓝图。

(本报记者董克难对本文亦有贡献)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在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生态文明论坛上作报告。

COP15 人物专访

◆本报记者周亚楠

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数据,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目前现存的810万物种中,超过100万物种处于灭绝边缘。今年以来,高温、干旱、暴雨、洪涝等极端气候事件变得更加频繁……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正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二者之间如何协同治理?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

气候变化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因素之一,二者相互关联

在10月14日举行的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生态文明论坛——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平行论坛上,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执行秘书安妮·拉瑞高德表示,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分别是:陆地和海洋利用的变化、生物资源利用、气候变化、污染及外来物种入侵。气候变化是因素之一。

对此,王毅表示赞同,“全球升温及其带来的相关变化会破坏物种栖息地,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进而增加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而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后者包括对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当生态系统被破坏之后,反过来会加剧气候变化的危害。”

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相互关联的,都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IPBES和IPCC共同支持的一份报告称,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空前变化已经结合在一起,并且威胁到世界各地的自然和人类及其生计、福祉,同时强调,除非同时考虑这两个问题,否则这两个问题都不会得到成功解决。

如何推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治理?

碳达峰碳中和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解决的不仅是能源、气候问题,还有生物多样性危机。作为此次大会的主要成果,2021年10月13日,COP15高级别会议通过了《昆明宣言》,这是联合国多边环境协定框架下首个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政治性宣言。宣言承诺,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但只有政治意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制定具有雄心并科学务实的目标、清晰透明的实施路径和配套政策,采取切实行动以推动达成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共识。”王毅表示,这也是与会代表们的共识。

如何推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治理?王毅认为,应该从制度、具体措施等方面考虑。

首先,在制定好上述框架下,构建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一协调机制。制定有关《巴黎协定》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联合履约计划,在科学评估基础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如何构建?

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

COP15 现场报道

◆本报记者董克难

谁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推手?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樊胜根指出,全球食物系统多样性是主因

“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其背后除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关乎生物多样性。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樊胜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生物多样性每年价值33万亿美元,接近美国和中国GDP总和。”樊胜根介绍说,1992年至2014年间,全球人均生产资本翻了一番,人均人力资本增长约13%,但人均自然资本存量却下降了近40%。

“全球食物系统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推手。”樊胜根表示,在过去50年中,自然生态系统转化为作物生产或牧场是栖息地丧失的主要原因,从而严重威胁了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数据表明,在面临灭绝危险的2.8万物种中,农业对其中的2.4万种构成威胁。

这其中有以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膳食结构不合理。以更低成本生产更多粮食的目标驱使我们采用集约化生产模式,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使土壤和生态系统退化,降低了土地的生产能力,从而需要更加密集的粮食生产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形成恶性循环给环境保护和水土资源带来巨大压力。

第二是粮食生产严重依赖投入型物料,如化肥、农药、土地、水等。单一种植和重翻耕作减少了生物栖息地多样性,威胁破坏了鸟类、哺乳动物、昆虫和微生物的繁殖和生存,并排挤了本地植物物种。

第三是食物系统加剧气候变化的影响。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食物系统也在推动着气候变化,更加恶化了栖息地环境,并导致物种分散到新的地点。反过来,这又使新物种相互接触和竞争,并为传染病的出现创造了新的机会。

基于此,樊胜根提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路径。“全球饮食模式需要更多地转向以植物为基础。”樊胜根进一步解释,因为畜牧业生产对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和环境的影响巨大,所以转向植物基础饮食将有利于世界各地人口的饮食健康,并有助于降低流行病的风险。

此外,“减少”是关键词之一。一方面要减少全球食物浪费,通过减少需求来减轻包括土地、水等资源压力。另一方面,应减少土地转换和开发。“因为保护土地不被转换或开发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方法,在闲置的农田上恢复原生生态系统为增加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多机会。”樊胜根说。

全球治理过程中,还应推广中国智慧和方案。“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和生态效益评估等举措,不仅为我国在生态治理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优质和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樊胜根表示。

如何进行自然资本核算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着力共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

◆本报见习记者于天昊

草原、河流、森林、海洋……优美的生态环境,为我们提供了赖以栖息的生存场所,为我们带来了身心的愉悦,但你是否想过,这些自然资源,也可能转变为具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带来经济收益?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就是把自然资源转化为可以造福人民的生态经济价值。在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生态文明论坛“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分论坛上,与会代表就相关话题进行了研讨。

自然资产核算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是什么?

习近平主席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近年来,我国多渠道积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保值增值,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自然资本的核算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优质的生态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云南省副省长任军号说。

在自然资本核算方面,许多国家都开始了试点。2011年,英国组织500多位科学家进行了全面的生态系统评估。2012年,澳大利亚也对土地和生态系统进行了核算。2012年,联合国批准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核心框架”,2013年进一步采纳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实验性生态系统核算”。

在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系统之间,仍缺乏有效的指标来测度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贡献。

基于这个背景,我国专家学者在2013年就提出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Gross Ecosystem Product)的概念,即生态系统在一年中提供给人类的最终的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

中国在这方面进展如何?

搞好自然资源成本核算,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

“我国在2000年开始,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建立了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方法。2004年,由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基于环境经济核算的绿色GDP核算报告,在2006年后又开展了多年的环境经济核算活动,将生态破坏成本也纳入了核算体系下,并且建立了生态系统核算的技术框架。”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生态环境风险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任方说。

据任方介绍,2015年,我国正式启动全国GEP核算活动,2017年,王金南院士又提出GEP就是社会经济生态价值的概念,将人类经济活动和环境退化活动以及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纳入到核算体系下,形成了现有的GEP框架。

“在生态环境部的组织下,我们进行了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总产品核算的第一步,即将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空间化,这样我们就知道生态系统在哪里提供了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得到了我们国家生态保护空间重要的空间格局图。”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郑华说。

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了2025年和2035年的主要目标。要求着力共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

“自然资源部圆满完成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基本摸清了全国自然资源的家底,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科学推进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划定,制定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规划,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不断夯实

“两山”转化的基础和政策支撑。”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司长周远波说。

“中国科学院研究中心牵头研究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规范办法,并在多地实践应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司副司长马强说。

浙江丽水发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指南,一些地方开展了市县乡村四级GEP核算,深圳出台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规范,并建立了生态产品价值与经济的双考制度……

各地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方面开展了大量探索,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具备了总结提炼成政策制度体系并加以推广应用的坚实基础。

自然成本核算还面临哪些困难?

“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一项全新的改革探索任务。面临着核算标准不统一、市场交易不全面、保护补偿不精准、金融支持不完善等诸多难点和难题。”马强说。

“自然核算的可重复性、结果的可应用性、模式的可推广性,是目前面临的三个挑战。”郑华指出。

“自然财富要转化为经济财富,转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投资的过程。”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俊表示,“目前的问题是,按照最近的一些研究,全球每年大概需要1万亿美元左右与自然相关的投资,但是只实现了百分之十几。我认为,庞大的缺口应该由金融体系来填补。银行、保险、投资、基金,要动员这些资本到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本友好型投资中去。”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本,以人类的福祉为中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生共进的目标。”云南省林业与草原学院院长教授杨宇明说。